

列宁晚年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李金花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泉州362021)

[摘要] 晚年的列宁将思考的重心转移到文化方面,在其最后的“政治遗嘱”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建设思想,体现了列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他对官僚主义等不良习气的批评,对革命党有可能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的警告,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列宁; 文化建设; 文化“征服”; 启示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5-0020-05

在列宁早期的思想中,对文化建设远没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那么重视。但到晚年,他日益认识到:“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1]763}“现在,只要实现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这说明他已看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联性,因此他对文化建设作了系统的思考,这些文化建设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列宁晚年文化建设思想的缘由——重心转移

列宁的思想历程是有其合理的逻辑性的。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认为,社会发展的“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应该在社会文化发展到拥有高度文明的程度后,才能进行社会政治革命和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以俄国的落后性来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对此列宁反驳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777}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三步骤:政治革命创造前提,经济建设奠定基础,文化建设推动发展。

首先,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776}正是由于俄国所面临的世界历史的特殊形势和国内处于

东方革命边缘的特殊状况,俄国才有可能出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从而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政治变革先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可能性。

其次,当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后,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发展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必须通过经济建设使苏联强大起来,抵御外敌的干预和入侵,巩固政治革命的成果。经济建设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只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才会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最后,一国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决不能和文化建设相脱轨,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及其政策实行才能顺畅。当政权初步巩固后,列宁逐渐把思考问题的中心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晚年的列宁指出:“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1]585}但是这个“小事情”却是关乎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他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773}他认为三者的关系应该是:政治革命和经济发展为文化建设“奠基”,同时文化建设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

二 列宁晚年文化建设思想的内容

列宁把文化建设问题提到事关党执政地位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来对待。为此,他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并提出

了如下的设想:

(一)核心在党,重点在民

列宁强调,执政党能否成功执政,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在一定意义上,“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2]。然而在苏联进行国家建设中文化建设上的不足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所面临的巨大“敌人”^{[1]590}。由于苏联执政党是在前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旧文化的影响。列宁敏锐地觉察到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有可能从军事上的“征服者”变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问题^{[1]680}。而共产党一旦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就失去了执政的文化根基。因此,必须从三方面加强文化建设。

一是执政党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提高文化素养。“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1]786}对共产党员中的文化教育不是让他们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唱共产主义的政治高调,重要的是“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285}同时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进行科学技术、行政管理的教育与培养,使他们更加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二是执政党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提高纪律性。这关系到党性原则,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如果党组织没有纪律性,一盘散沙,那么执政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会受到削弱。列宁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3]766}执政党组织建设事关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更关系到执政党内部的“稳定性”^{[1]744}。他说,白卫分子把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注压在我们党的分裂上,压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这为布尔什维克执政党敲响了警钟,党内可以存在不同的意见,但不能允许党内的意见分歧上升为组织分裂。“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135}

三是执政党加强自身的法制建设,培养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文化发展的深层合理内核,但俄罗斯社会却缺乏法治传统。列宁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1]702}党

政机关内部普遍存在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俄罗斯沙文主义、严重的官僚主义等等不良习气,这些是共产党人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者和组织者的严重障碍。因此,加强党内的法制建设,塑造法治精神就显得十分必要。

除了执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外,列宁也非常重视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养。列宁清醒地看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4]这对苏维埃国家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连续5次强调了“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的问题。然而,“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1]294}所以“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1]770}为了实现“文化革命”,首先要使群众接受广泛的教育,尽量扫除文盲,做到“人人识字”“读书看报”,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有“足够的见识”^{[1]770}。为了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执政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学习的两个层次要在统一体系中进行,为此执政党不仅要发挥“先锋队”的作用认真学习并且在学习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要帮助群众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列宁明确昭示全党:“现在全部关键在于,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一道前进,用行动、时间和经验向农民证明,我们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够学会帮助他们,率领他们前进。”^{[1]700}

(二)兼收并蓄,批判继承

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进行文化建设应该批判借鉴有价值的优秀文化成果。列宁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285}“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1]299}此段话包含几层意思,一是强调文化的历史沿承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空中楼阁,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

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285}。二是这种对沿承性应该持有的姿态是在批判基础上的吸收和改造。在文化问题上,列宁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反对全部接受,全盘它化的考茨基主义;又反对全部否定,全盘发展的蒙昧主义,故可以批判继承,因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5]这就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可以借鉴利用它建设社会主义。三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的基础上对旧文化进行改造创新,与时俱进,这是文化建设的重点。列宁认为,文化方面的创新,才能为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要想使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取得成效,就必须因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对苏联旧有的文化加以改造,以适应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内在特点在于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事件推动下“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6]对文化的创新发展,才能实现文化建设的繁荣。

(三)尊师重教,育才强国

文化建设的根本在于教育。首先,列宁十分重视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一方面,他要求增加对教育的财政支出,“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1]763};另一方面,他主张要精简官僚机构,节省费用用于教育投资。他说:“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1]763}其次,列宁强调要提高教师的地位,发挥广大教师的作用。教师在社会建设中起着文化启蒙的作用,列宁认识到,依靠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唤醒更多人的觉悟,激起更多人的热情。由于旧俄国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下,物质生活条件差,工作得不到尊重,在此时期列宁从尊重教师和提高他们地位的角度出发,主张称教师为“人民教师”。他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1]764}“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1]764}。即使国家建设很困难,列宁也主张对教师要“优待”^[7]。纵使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联粮食供应最为紧张的时期,列宁仍批示有关部门:

“应当削减其他人口的粮食,而不应当削减教育工作者的口粮。”^[8]同时他还提出应该从政治上信任和关怀教师,要有计划地选拔具有丰富理论、实践知识的教师到领导岗位上,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可靠支柱。最后,收纳知识分子和各行专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苏联建国后,党内具备各种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很少,国家建设需要的大量人才很匮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列宁一再强调说:“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文化因素才能建设社会主义,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因素。”^{[3]215}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需要这些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9]“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10]因此,需要对资产阶级时期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从政治上团结他们,物质上资助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工作上信任他们,使他们能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三 列宁晚年文化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实事求是地说,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随着时空的转移,有些方面并不一定能照搬到一百年后的中国来,有些方面甚至是不合适的,但它同样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例如,在如何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应该由党内最有觉悟、水平最高的少数领袖把社会主义觉悟,由上而下“灌输”到党内外群众的头脑里。这样的看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史观,也不符合我党关于“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更不适应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情况,因为“灌输”是封闭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中,想靠由上而下“灌输”是行不通的。又如,列宁关于“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可能成为某些人压制党内民主的借口。邓小平同志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1]333}32年前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已经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所导致的“家长制”、“一言堂”等弊端,直到最近中央领导还在重提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可见我们还没有

很好地解决党内民主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2]文化越发展,社会就越文明、融洽。在国外,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要想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培植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内,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文化建设在深化改革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列宁晚年的文化建设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借鉴:

第一,列宁对苏联党政机关内部普遍存在“奥勃洛摩夫习气”、俄罗斯沙文主义、严重的官僚主义等等不良习气的批评,对我党当前的党风建设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因为相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一个社会剧变与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优良党风成为执政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实中党风建设因未能跟上形势的需要而成为文化建设的瓶颈。在思想作风上,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懈怠,思想松弛,执政理念固化,教条主义,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党风;在工作作风上,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问题严重,弱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丢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党风;在生活作风上,一些党员干部奢靡享乐、生活腐化,以权谋私,忘却了艰苦朴素的优良党风。这些现象若不解决,不仅会损害干群关系,更会严重影响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一党的长期执政,党内容易滋生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思想上要坚定理想信念,拒腐防变,并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党风。工作上要摒弃政治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增加党内党外的民主之风。生活上要廉洁自律,谨言慎行,克勤克俭,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党中央号召要“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可见只有抓好党风这个纲,纲举目张,政风、民风及文化建设的目才能被带动起来。

那么如何抓好党风这个纲呢?具体说有三环节:学习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民主是保障。

首先,学习是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才能够理解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的密切联系,才能使正确的价值观真正内化为真诚的信仰。其次,仅凭党员干部的自觉学习和自我约束毕竟是不可靠的,党风建设既要加强党内

监督,也要增强党外监督,如司法机关监察、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网络监督等,除此之外,更要加强群众监督。邓小平一贯主张依靠群众监督作用遏制不正之风,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1]332}为党风建设提供规范性的支持。最后,民主建设是加强党风建设的顶层设计。民主是现代文明最根本的制度安排,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自我的理论学习归根到底是民主精神的内化,权力监督是民主原则的外化。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333}因此没有民主制度这个顶层保障,价值观的培养就缺乏正确的导向,所谓监督制度也可能沦为摆设。

第二,列宁严重警告军事上胜利的共产党一旦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就失去了执政的文化根基。这就敏锐地看到了旧文化对革命党的腐蚀作用,它可能导致权力异化,最终导致政权解体。对中国来说,上述党风问题只是表面现象,潜藏在其中的则是旧文化的毒害。这种情况中国可能比俄国更严重。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文化特别强大,在历史上它不但“征服”了胜利的农民政权,而且“征服”了挂“共和”招牌的民国政权。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封建文化的幽灵仍未被驱除。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11]332}中国改革开放虽然有30余年了,但封建主义残余至今仍未肃清。如果说解放后的前30年是因为革命胜利后执政党未能依据时势的变化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那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已经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了这个问题,再加上苏联的垮台与文革的教训,对封建文化的危害已经不能以“认识不足”为托词了,根本原因就在于行动不足,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列宁所说的革命党成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这个问题一直未受到高度重视,结果是这些年来官本位思想、家长制作风愈演愈烈,权力监督的缺位培育并壮大了权钱勾结的利益集团,它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群体事件频发。列宁的警告与苏联的前车之鉴均表明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

“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文化建设的任务,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战略举措。十七届四中全会,警醒我们党目前正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

验”的挑战,而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就需要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坚持改革创新,引领全面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重点是要加强执政党的文化建设,塑造党执政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内涵,从而应对深刻变化的经济、政治形势。十八大报告,更是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论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亦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逐步进行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过程都是不可逾越的。我们认为,文化建设不要流于做表面文章,而要针对当前的根源问题下工夫。什么是根源问题呢?这就是滞留在许多官员头脑中的旧思想旧文化,及其行政中的作为与制度上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建设“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1]332}。就前者而言,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1]335-336};就后者而言,“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

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1]336}小平同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1]328}因此,重温列宁晚年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与小平同志的“8·18讲话”,打好改革的攻坚战,是突破改革瓶颈的根本出路。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3.
- [3]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 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4.
- [5]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
- [6] 韦定广.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01.
- [7] 列宁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4.
- [8] 列宁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68.
- [9]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2.
- [10]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2.
-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2.

Lenin's Thought of Cultural in His Later Years and Its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LI Jin-hua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Lenin diverts his attention to culture in his later years. And his final “Political Testament” is rich in the though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shows that Lenin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e socialist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his criticism towards unhealthy tendency like bureaucracy, his warning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s being conquered by the old culture, all of which are great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enin; though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quest”; enlightenment